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

走进“三农”论“三农”

徐元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

走进“三农”论“三农”

徐元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进“三农”论“三农” / 徐元明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1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

ISBN 978-7-5506-1067-5

I. ①走… II. ①徐… III. ①农业经济—中国—文集
②农村经济—中国—文集③农民—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F32-53②D422. 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8335号

书 名 走进“三农”论“三农”

著 者 徐元明

责任编辑 汪允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9.5

字 数 543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67-5

定 价 6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

编委会

主 任:宋林飞

副主任:张德华 陈 刚 周祥宝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伯平 包宗顺 孙克强

张 卫 杨颖奇 吴先满

陈 颐 陈爱蓓 胡发贵

胡传胜 姜 建 葛守昆

韩璞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

总 序

2010 年,我们迎来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

30 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社科院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尤其是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不断增加、积累,学术影响和地位不断扩大、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建院 30 年,我院研究人员牵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共 63 项,牵头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共 208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14100 多篇,出版学术著作 900 多部,共有 246 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国家、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些成果来之不易,是全院广大科研人员勤劳智慧之结晶。

30 年不断发展创新的科研过程,形成了我院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学科带头人,特别是那些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的教授、研究员,他们为我院科研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在庆祝建院 30 周年之际,我们决定为我院享有以上三类专家称号的教授、研究员出版个人文集,作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隆重推出,委托凤凰出版社出版,每位专家 1 本,每本 40 万字左右,主要汇集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后,我们还将为我院上述三类专家称号的新获得者(已出专家文集者不重复出)和学科带头人出版专家文集。

首次列入出版专家文集的这 21 位专家,涵盖了我院经济学、社会

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多种学科，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辛勤耕耘，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长期探索，形成了丰富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新了研究方法，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的成功的科学研究之路，在全国和江苏省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受到社会的广泛称赞和好评。这是我院事业兴旺发达、科研持续发展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全院同志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借鉴。如今，这些专家，他们中有些年事已高，却依然忙于笔耕；更有不少年富力强者，他们任务重，压力大，积极作为，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强调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功能作用，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行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为本。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努力把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到自己的科研实践中去。在我院事业发展的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继承发扬我院已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视实际调查和科研团队协作等优良传统与作风，与时俱进，进行一系列新的开拓创新。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贴近现实，贴近决策，努力创建一流的地方社会科学院。我们陆续推出了江苏经济形势分析会、重点课题研究、江苏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咨询要报》、江苏研究报告、江苏研究丛书、院学术文库和青年学者文库、比较优势学科基地建设、研究员论坛、《江苏通史》、《历代江苏名人辞典》、《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等重大科研工程项目与活动，有效调动了全院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研成果增长加快，成果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让领导满意、学界认同、社会欢迎。这些重要的开拓创新与努力及其形成的成果为我院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江苏也正处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进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我们社科工作者去研究探索。我们社科院的同志要戒骄戒躁，踏实前进，不断创新，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力作，

通过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力作,而多出人才,多出专家、名家甚至大家。不仅深入研究江苏,而且要重视研究全国性、普遍性的问题,还要有世界眼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加强学理性,突出重点,搞好协作攻关,努力提升工作水平,进一步彰显我院的特长与优势,为国家和江苏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正是 30 年前江苏省政府批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扩建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日子,仅以上述所言为专家文集总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教授

宋林飞

2010 年 6 月 3 日

作者小传

徐元明,1945年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65年江苏省海门中学高中毕业,1970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82年以来供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经济探讨》副主编、《中外企业》主编,2004年受聘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社会兼职: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江苏省工商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农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致力于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的调查与研究。先后主持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项目:《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比较研究》、《华庄镇镇情调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江苏乡镇企业研究》、《江苏乡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苏南乡镇企业体制创新研究》、《江苏省城乡统筹发展现状评估与推进策略》;省领导圈点委托研究项目:《东部地区工业化比较研究》、《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收益分配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评估与推进策略》、《苏南模式研究》;中日合作项目:《中国江苏省苏南地区企业发展与工业化研究》、《中国江苏省南部地区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研究》;省政府部门委托研究项目:《乡镇企业投资宏观调控研究》、《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土地利用与农民权益保障研究》、《沿江农业资源综合开发规划》等。

共出版专著、编著 19 部,主要学术专著、编著有:《苏南模式研究》、《苏南农业新思维》、《塘桥工业化之路》、《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比较研究》、《乡镇企业营销学》、《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教程》、《菜篮子问题研究》、《乡镇企业投资宏观调控研究》、《太湖明珠——华庄镇》、《异军突起在苏南》、《江苏乡镇企业新论》、《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新扬州现象》等。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咨询报告 200 多篇。

《江苏乡镇企业新论》等四项成果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要作者之一的《苏南现代化》(前四名)、《江苏省乡镇工业史》(前三名)分别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主编的《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获江苏省第三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特等奖,《苏南模式研究》等 8 项研究成果获有关学会、会议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自序

感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为我提供出版论文集的机会。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三农”，这不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还因为我就读于农业大学，有十年农业农村工作的经历，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研究。我喜欢农民的善良、诚朴、勤劳，喜爱绿色原野的勃勃生机。

幼时的农家生活

我的出生地江苏省海门市，原是个数度沉浮的沙洲。海门的先人来自江南的沙里人（意指生活在沙洲上面的人），世代的治沙垦殖，养成海门人拼搏进取、不畏艰巨的乐观精神和坦直率真的性格。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海门农村度过。

作为江海沙洲，海门的先辈早就在境内开挖建成通江入海的由竖河、横河、明沟和涵闸组成的水利枢纽工程，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在河、沟、塘（池塘，也称作宅沟）钓鱼、摸虾、网蟹。到了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玩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海门农村，居民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粗麦饭。我家的两间草房，桁料只有胳膊粗，椽子用的是竹梢子，芦苇编织成的“墙”，毛草铺顶，冬天屋外下大雪屋内下小雪，夏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照明是自己做的煤油灯，童年时代的我，就在这煤油灯下读书写字，额前的头发不知多少次被油灯的火苗烧焦，鼻孔被熏黑。

那时我家的生活比较清苦。做衣被的布料是母亲用自家种的棉花

纺织而成，全家人穿的衣裤、鞋袜，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农家孩子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在弟兄4个中，我最小，习惯了穿补丁衣服。海门是旱作地区，不种水稻，元麦、玉米、山芋干是主要食粮。面食（面条、馄饨）、大米饭只在逢年过节时吃上。春季青黄不接时，一天三顿喝稀粥。

贫苦农家的孩子从小就得干活。最初是扫地，大一点后，就是割羊草，到了初中后，每年的夏、秋两个忙假和寒暑假，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男整劳力每天记10个工分，妇女整劳力记8个工分，像我这样的孩子只算半劳力，记4个工分。到了高中阶段，就加入到男劳力行列，要往地里担粪，装满粪水的一对粪桶重100来斤，我只能挑大半粪桶，一天可记7~8个工分。年底分红时，好的年份一个工分值1毛钱，歉收年份只有六七分钱。那时，父母加上两个哥哥（大哥部队复员后成家另过），年底扣除各种食物分配后，能分得100~200元，还是生产队分配最多的。

我的求学之路

我的父辈们都是文盲，在徐姓家族中，只有一户读书人家。我能上学读书，得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泽东，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是上不了学的；也要感谢父母兄长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的爱和付出，我不可能读完高中，不可能上大学。虽然父母早就年老过世，三哥与二哥因积劳成疾，于前年和今年相继离我而去，但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已刻心中。

1953年，我九岁时到本村的和平小学上学。学校很是简陋，两间教室，学生自带桌椅，总共两个老师，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那时的小学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1957年我初小毕业，升入离家2里路的大兴小学读高小。那时的中学很少，能从小学升入初中读书的孩子可谓是十里挑一，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1959年升入公社所在地的天补初中。初中阶段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吃过野菜、树皮、瓜藤等，上学时拿上胡萝卜充饥。学校也

在建设之中,上课之余,我们还要在学校的工地上搬砖头。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部分学期都是三好学生。1962年初中毕业,幸运的是我又成为少数能够进入省重点中学——海门中学读书的学生之一。

进入高中后,我就住校了,起初每周回家一次,后来学习紧张,就不怎么回家。1962年以后,家里的日子也好起来,父母经常让三哥给我送好吃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年端午节,母亲都会包好多粽子送给我,我把粽子放在装满水的盆子里,慢慢地吃上一个星期。母亲包的糯米粽子棱角分明,大而漂亮。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如此可口的粽子了。

高中阶段的学杂费就多了,包括住宿费,一年需要100多元。父亲经常跟我算账:像我这样的年龄,读书一年支出100多元,在家劳动挣工分,一年收入100多元,这一进一出就是200多元。所以,我时常告诫自己:必须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对得起父母兄长。

1912年建校的江苏省海门中学,有一批治学严谨的老师,上课不用讲稿,讲解深入浅出,晚上夜自习还到教室为学生辅导。特别是各门学科的高考题目都是老师们让我们练习过多次的类型。因此,高考的结果,除受“唯成分论”影响的少数同学外,全班同学都升入高等院校。

1965年高中毕业时,在选择上什么样的院校时,我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是在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时,经常思考如何把生产队经营管理好,把生产搞上去,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就是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大学;二是首都北京是我向往的地方。

当我接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家人好高兴,特别是父亲觉得我为家里争光了。母亲则忙着为我准备上学用的衣被。1965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有着和我一样的经历。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有助学金,我是每个月17元,每月的伙食费12元,

余下的5元积存到一定数目后，还寄回家一部分。北京农业大学坐落于北京西郊的马连洼，紧靠学校北边就是实习农场，进校的第一个月，我们就参加农场的秋收劳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即1966年3月，全班同学到离北京200里的河北涿县（现涿州市）分校半农半读。我们一边上课学习水稻栽培学，一边参加稻田整理，及育苗、移栽、管理等生产劳动。大田插秧是一项繁重的技术活，光着脚丫下水田，弯腰曲背，倒着后退，眼望前方，右手的三个手指不停地从左手中摘取秧苗插入烂泥中，并且保持一定的行距和株距。这样的劳动，对于农村出生的学生不算难事，但对于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却非易事。

遗憾的是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使我的求学愿望破灭。值得回忆的是在华北大平原上劳动锻炼的一段经历。1969年11月，在驻校解放军宣传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武邑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班36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在武邑县西观津村的村民家中。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农民居住相当集中，一个村庄几百户上千人口，户户相连，每户都有一个独立小院。农民住房除屋顶的横梁用木料外，周围的墙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吃的也很差，村里人告诉我们，不少人家几年吃不上一顿肉。但农民的劳动十分繁重。在这里的10个月中，我们和村民们一起参加开挖人工河道的水利工程建设。一大早我们就带上干粮，推车、挑担前往施工地点。那时正是天寒地冻季节，人们只能用钢钎凿开冻土层，经过20多天的艰苦奋斗，硬是肩担人挑开挖出引水河道。第二年春天遇上大旱，5月中旬玉米还不能下种。眼看等雨无望，只能担井水浇穴下种。整整一个星期，不少同学的肩膀都压肿了。1970年夏天，为响应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在村子的主要干道上动工开挖地道。这似乎有点荒唐，但却是真实的。先在一定距离开挖取土井，井深2米以上，然后向两边开挖。地道很窄，人在里头只能弓着腰走，人跪着用镢头刨土，满筐后通过人链一个个传递出去。我们仿佛穿越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

1970年的7月,要分配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是很可悲的,五年中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有一个顺口溜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们这群大学生,即:政治上的臭老九、业务上的大草包、经济上的穷光蛋。所谓的毕业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发配,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江、浙、沪、闽、粤五省一市的同学不是大西南就是大西北。我被分配到了陕西省的咸阳地区。

黄土塬上的十年农村工作经历

刚告别贫穷落后的华北平原,我又来到穷山恶水的黄土高原。1970年8月下旬,我被派遣到陕西省长武县工作。至今仍清晰地记起前往长武县的情景。汽车从咸阳出发,经过礼泉、乾县、永寿,地势越来越高。过了永寿梁,连续的下沟上塬,汽车在曲曲弯弯的陡坡上盘旋着慢慢地行走,望着车窗外的悬崖,我的心绷得紧紧的。车子过了位于泾河边的彬县县城,再次上塬,下午四点左右到达长武县城。165公里的路程,行驶了近10个小时。长武县东与陕西省彬县为邻,西与甘肃省泾川接壤,北与宁县、正宁县接壤,是渭北与陇东高原结合部的过渡地带。因历史上是“常常用武之地”而得名“长武”。县城所在地海拔1200米左右。长武县是个小县,土地总面积567平方公里,1970年只有11万人口。

到长武县报到后,被分配在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由于农技站刚恢复,尚无办公场所,随即被派往正在施工中的县重点水利工程——朝阳水电站工地。这是一个集全县人力物力财力的水利工程,即在泾河上游拦河筑坝,将水通过13公里渠道引到下游的水力发电站。在工地上,民工们用铁锤、钢钎开凿山洞,手指被铁锤砸掉、胳膊被砸断是常有的事,还有在处理哑炮时被炸伤炸死,或被炸飞的碎石砸伤砸死。整个工程死亡13人,伤无数。民工们住窑洞睡地铺,吃的极其简单,每天1斤半粮,一天吃两顿,每顿两个高粱面馒头。没有蔬菜,只有生辣子、生葱、生萝卜,放上盐和醋将就。整个电站工程建设历时3年,农民不仅得不到报酬,还要由生产队出钱出物,自带口粮。

1972年底,朝阳水电站建成发电,我也回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这时的农技站被安置在唐代建筑——昭仁寺内,寺内有唐碑和无梁大雄宝殿(现在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初我又到该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相公公社胡家河大队蹲点。这年我利用水电站引水渠的泾河水在河滩地里试种水稻,在学校学到的水稻栽培技术派上了用场。长武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种植水稻获得成功,试验田亩产达800多斤。我的水稻栽培试验总结报告得到县农业局长的赏识,1974年被调到农业局工作,不久,又调县委农村工作部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从而有了全面了解长武县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机会和条件。

长武县是典型的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有面积较大且较为平坦适于耕作的原(或塬)地,有原地被长期流水侵蚀分割形成的梁地,有峁地(山丘),泾河、黑河、南河3条河流贯穿境内,由此形成塬高、沟深、坡陡的地貌特征。沟壑区交通极其不便,“对面可讲活,相见得半天”。县乡(公社)之间没有像样的公路,农民需要的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出的农副产品全靠人力和畜力运送。特别是雨水很少,年平均降水量不到600毫米,且主要集中在夏季。全县40多万亩耕地,能浇上水的只有3万多亩。春季是十年九旱,夏粮收成极差。以雨水较多的1974年为例,全县20.77万亩小麦,平均亩产227斤。

长武县农业的落后,除自然地理条件外,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破坏也是个重要原因。农业学大寨,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结果,不仅使山坡地土层遭到破坏,而且使原先尚有植被覆盖的岗坡地成为荒山秃岭,恶化了生态环境,加剧了干旱程度。

长武县的居民绝大多数住在土窑洞里。建造窑洞只要有劳力、有力气就行,既省钱又实用,冬暖夏凉,是沟壑区贫苦农民的理想居住方式。农民睡的是土炕,炕上铺张席子。窑洞和土炕容易潮湿,临睡觉前都要把炕烧热。为了省点柴草,往往一家老小挤在一个炕上。在电站工地和蹲点期间,我就在这样的土窑洞里整整住了3年,还因为窑洞内阴凉潮湿而生过病。

泾河每年第一次洪水来临时,都会从上游漂流下大量的柴草树木,

为解决燃料问题,泾河边的村民们会不顾生命危险下河捞柴。我曾目睹过这样的场景:那是1973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发现村民们一起往河边跑,跟过去一看,泾河发大水了。全村男女老少在岸边一字排开,男人们一丝不挂地站在湍急的泥水中不停地捞着柴,女人和孩子们则忙碌地帮着倒腾运送。人们还眼睁睁地看着河中间一男子抱着一棵大树飞快地顺流而下,既无法靠岸,也无法相救。

黄土高原缺水,居民饮用水的困难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塬区居民家家有口深达数丈的水窖,饮用水就是靠平时积蓄的雨水,遇到干旱年份,水比油贵。住在塬边的居民要到数十丈深的沟底担水,一次2~3个小时。为了节约用水,盖的被子从来不洗,油光光的,也极少洗澡和换洗衣服。1971年我参加塬区一个生产队的麦收,住在农民家里,十多天时间我没有刷过牙,洗过脚。至此我才体会到黄土旱塬水的珍贵,“宁可给人一个馍吃,也不肯给人一碗水喝”,这话一点不虚。麦收结束时感到全身发痒,脱了衣服一看,缝隙之间潜伏了不少白色的虱子。由于生活环境恶劣,有些地方整村人患上大骨节病,成年人的个子只有1米左右。

1979年6月,我被调到陕西省农林办公室,从此离开了长武县,从1970年至1979年,我在黄土高原整整工作了10个年头。

三十年的“三农”问题研究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78年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始在社会上公开招收研究生。1979年我用40天时间,起早贪黑地复习了全部应考课程,应考结果,除外语外,其余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我被录取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转折(第一次是考上大学,第二次是到黄土高原工作)。

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得到吴麟鑫、夏顺康、王万仓三位老师(就我一个学生)的指导,系统地学习了农业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9月我被分配到江苏省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所长顾松年要我侧重于社队企业的研究，这正合我意。因为在这以前，我就对上海郊区、苏南等地农村兴办的社队企业很感兴趣，并强烈地意识到：兴办社队企业、农民办工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自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与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主要针对社会上对农民办工业的各种非议，着重研究乡镇工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三农”、对国家工业化所作的贡献，论证乡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正确把握乡镇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脉络，1984年起我把张家港市塘桥镇作为研究基地。曾在该镇住了二十多天，走访了该镇的大多数企业，与厂长们彻夜长谈。1986年与叶鼎同志合作出版了《塘桥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题写了书名。这是我的第一部关于乡镇企业的著作。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对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进行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与沈立人同志共同主编的《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比较研究》，与叶鼎同志合著的《乡镇工业的管理风格》。九十年代中后期，围绕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因为争论比较激烈，我和我的同事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在著作《江苏乡镇企业新论》和“南通市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考察报告”中，充分肯定江苏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乡镇企业的体制转换是江苏省乡镇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源。1998年7月我接手主编《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前后经历了组织发动、搜集资料、撰写志稿、审改总纂四个阶段。1999年9月告成，2000年12月出版。这部70余万字的志书记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乡镇工业的发展轨迹，对其历史和现状都作了翔实、准确的反映。顾焕章教授称其为“一部再现江苏农民伟大创造的志书”，在2001年11月江苏省第三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评比中获唯一一个特等奖。这是我竭尽全力主持编写的成果，也是我国唯一一部关于乡镇工业的志书。2000年以后，在与日本国名古屋大学竹内常善教授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江苏省苏南地区企业发展与工